



语言符号和修辞的多样性和民族性^{*}

王文斌 崔 靛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提 要 符号修辞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借用符号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语言是人类使用符号的主要形式,是人类思想的重要载体,但是,语言符号因使用者的民族不同而具有多样性。修辞是人类语言符号组合的方式,负载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思维方式。如果说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文化性,文化具有民族性,那么自然就可推绎出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民族性。英汉语的文字符号差异和句构修辞差异充分说明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而且藏匿于这些差异背后的是英汉民族的时空观异别: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偏重于时间性思维,而汉民族则注重于空间性思维。

关键词 符号 修辞 表音文字 表意文字 句构 多样性 民族性

一、引 言

先看以下四个英汉例证:

(1a) mountain

(1b) 山(山)

(2a) water

(2b) 水(水)

(3a) Confucius had three thousand disciples.



(3b) 孔子弟子三千。(陈满华 2008:72)

(4a) There is a lake in front of the woods.

(4b) 树林前边一个湖。(吴为章 1990:14)

从以上英汉例证不难看出,语言符号和修辞无疑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英语(1a)和(2a)与汉语(1b)和(2b)这两对语言符号中,前者使用线性表音文字,而后者则使用象形表意文字,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与英汉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AYY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服务国家战略的外国语言与外语教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JJD740002)子课题“汉外语言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和 2018 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汉语流水句内在语义整体性探究”(项目编号:2018JX004)的阶段性成果。在复旦大学 2018 年 9 月 22 日举办的“‘符号与修辞’前沿理论工作坊”上宣读。

而且后者括号中的和,分别是甲骨文“山”和“水”的写法,其象形表意特征更为明显。英语(3a)和(4a)两句均含有动词做谓语,与其相应的汉语(3b)和(4b)两句,均不曾出现动词,全句均由名词性短语组成。

需说明的是,在此所言的多样性,是指语言符号和修辞在人类语言中的表现具有多种样态;在此所言的民族性,是指语言符号和修辞因民族的不同而表现出独特的形式。还需说明的是,在此所言的语言符号,是指语言的文字符号,而非其他类型的符号,如音乐符号、艺术符号、数学符号、物理符号等;在此所言的修辞,是着眼于其宽泛意义,指人类组合语言符号的诸种表现方式,即语言符号彼此结合用来表达意义时所使用的诸种手段。本文拟聚焦于英汉文字符号和句构修辞,探讨其多样性和民族性,并借此追索英汉民族的时空观异别。

二、文字符号的多样性和民族性

语言符号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中最为常用的符号形式,是人类用于交流和传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尽管各民族语言符号具有深层次的共性,均是思维表达的外在表现形式,可这些表现形式往往不尽相同,并不具有一致性。世界上存在表音文字符号和表意文字符号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就是力证。诚然,世界上还有象形文字符号,但就广义而言,象形文字符号也属于表意文字符号,这是因为表意文字符号是一种借助象征性图形符号,表达语言中的词或语素的意义,不直接或不单纯表示语音,而象形文字符号就是通过描绘客观事物外部形象的方式记录并表达该事物,与表意文字符号借助象征性图形符号本质上没有差别。

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体系,而汉语则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英语单词符号(1a)和(2a)就是表音文字,借用字母记录语言中的语音,从而形成语言的文字。英语文字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源自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又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则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尽管腓尼基字母基于苏美尔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所创造的楔形字,可也是对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进行了字母化改造,最终只有辅音字母,而没有元音字母,可不论怎样毕竟都是表音字母,由此逐渐演化出目前包括英语在内的印欧语字母体系。印欧语字母体系文字均呈线性排列,用以表音。如英语中,一个单词符号像一条线展开,可延伸得很长,明显具有时间性一维特征,如:

(5)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6) 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

(7) aequosalinocalcalinoceraceoaluminosocupreovitriolie

(8) bababadalgharaghtakamminarronnkonnbronntonnerronntuonnthunntrovarrhounaw-
nskawntoohooordenenthurnuk

(5)共有34个字母,出现于迪士尼出品的电影*Mary Poppins*的插曲,其意思是“奇妙的,难以置信的”;(6)共有45个字母,表示“超微硅火山灰吸入性硅肺病”;(7)共有52个字母,是英国医学作者爱德华·史特罗哲(Edward Strother)创造的单词,专用来形容英格兰格洛斯特夏布瑞斯陀这个地方的矿泉水成分;(8)共有100个字母,出现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表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其实,在英语中,这四个单词符号远非长词。一种含有267种氨基酸酶的物质,其汉语学名为“色氨酸合成酶A蛋白质”,可其英语单词符号共有1913个字母,若把这一单词写出来,起码要占30多行的篇幅。据说,英语中最长的一

个单词是由 189819 个字母组成,即近 19 万个字母,可能要花 3 个小时才可念完这一单词,的确让人震惊。英语单词符号可长可短,但不论怎样,其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即借用字母记录语言中的语音,从而形成语言的文字,再通过字母的线序组合表示词的意义。

汉语单词符号则不同。如:

- (9) 罍
- (10) 嫫
- (11) 𠂔
- (12) 𠂔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9)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所创,念作“zhào”,因此也有人称武则天为“武罍”;(10)就是表示“不要”之意,念作“biáo”;(11)念作“gū”,其本意是表示“功夫”,其引申义为“役工”;(12)读作“zhuó”,其本意是表示“连缀”或“短处”,如“圣人之思脩,愚人之思𠂔”。不论汉字怎样写,可从左到右,如“川”;也可从上到下,如“三”;也可上下左右混合,如“开”(先从上到下写两横,然后从左到右写撇和竖);也可从中间开始,如“水”等,其表意文字符号的性质始终不变,均用许多表意的符号来记录语言中的词或语素及其意义,从而整体地代表词或语素的读音,而且其构词的方式可在多维空间上进行,如汉字符号笔画之间既允许相离,如“川”和“三”,也允许相接或相交,如“开”和“井”等。其实,汉字符号还可借用其空间性特征采用多叠字来表达“多”或程度之甚等,如“又双叒𠂔”是最近的一个网络流行用语,表示某事物变化更替极为频繁,也表示一件事反反复复出现;“火炎焱燚”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络流行用语,形容火势越来越猛或表示某事物越来越受人欢迎,如:

(13) 印度电影又双叒𠂔来了,这一次还带来了一位“大姨父”。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135176220731052&wfr=spider&for=pc>(2018年12月4日读取))

(14) 重庆造火箭又双叒𠂔上央视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9947345421339252&wfr=spider&for=pc>(2018年12月4日读取))

(15) 全球变暖,火炎焱燚怎么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8376855882660567&wfr=spider&for=pc>(2018年12月4日读取))

(16) 这个公园又要在长沙火炎焱燚了。

(<http://mini.eastday.com/a/171125004332658-5.html>(2018年12月4日读取))

(17) 如此火炎焱燚的超人气书店,又双叒𠂔开 11 家?

(<http://news.winshang.com/html/062/2422.html>(2018年12月4日读取))

从以上各例不难发现,“又双叒𠂔”和“火炎焱燚”充分发挥了汉字符号构建多叠字空间性的特征,表达某种事物所出现的频率之高或程度之甚等。(17)更是将这种特征发挥到极致,“又双叒𠂔”和“火炎焱燚”并用,表达某书店越来越红火而开了多家分店。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书写符号,两者之间往往具有一种优选关系,即文字需要适应所书写的语言本身的特点,自源文字如此,借源文字也是如此,世界文字发展历史基本反映了这一规律。虽然世界上的文字多半起源于图画,“象形”是文字发端的主要源头(周有光 1998:8),但世界



上现有的文字特点各异,主要有上文所提的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其主因在于不同语言的发展方向差异导致与之匹配的文字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譬如说,阿兹特克(Aztec)文字与中国纳西东巴文字虽均为自源的文字画,但其综合与分解受制于各自语言的特点或发展方向,最后走入不同的发展路径(李葆嘉 1990)。阿兹特克语是印第安语的一种多式综合语,其基本特点是在表示动作行为成分的前后添加各种类似于词缀的成分,用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一个复杂的词就相当于其他语言中的一句话,如“ōtikmihiyōwiltih”虽类似于一个词,但其实际含义却近乎英语中的一句话“how you must have suffered”(其意为“你受尽折磨”)(奥斯特勒 2011: 10)。再如“wiitokhchumpunkuruganiyugwixantum”,看起来像一词,可实际上却相当于一个句子,由八个意义成分组成:“wii(刀) + to(黑的) + khchum(野牛) + punku(手的) + rugani(割) + yugwi(坐) + xa(将来时) + ntum(复数)”,其整体意思是“有人将坐着用刀割黑牛”。正因如此,阿兹特克语话语中难以分解出语言学一般概念上的语言单位“词”,其文字符号不具备与“词”的对应关系,只能适应其特点停留于语段式文字阶段,而尚未过渡到表词文字的发展阶段。然而,原先同为文字画的东巴文,已演变为表词文字,其发展方式与阿兹特克文相去甚远,其主因是与东巴文对应的口语系统纳西语已向孤立型语言方向演进,句中可分解出“词”这一语言单位,因而东巴文字符号由此获得了与“词”的对应关系。从阿兹特克文和东巴文的不同嬗变轨迹可以看到,自源文字虽是语言的自主选择,特定类型的语言会创造出特定类型的文字,但因历史、地理和人文等诸种因素的不同,语言因优选效应而走上适配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何清强、王文斌 2015)。

何清强、王文斌(2015)认为,即便是借自他种语言的借源文字,也同样存在文字与其所书写的语言之间的一种优选关系。这种优选关系通常都遵循“选取—评判—淘汰—再选取—再评判—固定”这一规律,往往经多次反复,不断加入自创成分,渐成符合语言自身发展的文字。腓尼基字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正式的腓尼基字母创生之前,腓尼基人先后使用过比布洛斯基音节文字(Byblos Script)、原始迦南文字(Proto-Canaanite Alphabet)、原始西奈文字(Proto-Sinaitic Script)以及乌加里特文字(Ugaritic Alphabet),但他们经实践发现,这些文字并不适合腓尼基语以辅音为主的特点,再经择优过程,他们最终选择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字形与辅音原则相结合,创制了 22 个辅音文字。由此可见,即便是借源文字,也涉及优选过程,文字与其所书写的语言特点之间须彼此适配。

英语字母符号属借源文字,现有 26 个字母,其源头是腓尼基人经借用而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如上所言,腓尼基人通过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改造,创制了属于自己的 22 个字母,后又经古希腊、古罗马人的修改,逐渐演变成为目前使用的英文字母。字母文字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主要用于表音,而且字符数量小,如现代希腊字母只有 24 个,拉丁字母 26 个,西里尔字母 33 个。在此需究问的是,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字母文字字符量小。何清强、王文斌(2015)认为,缘由主要有二:一是字母符号仅用于表音。英语字母文字,其单个音素一般仅表音而不表义,意义来自音素的一维线性组合。因此,其书面形式充其量只是其口语的视觉化转换,总体上接近于口语发出的声音。同为日耳曼语族成员的德语在这一方面要求更为严格,除外来词,德语的拼写与发音几乎完全一致,只要能说得出口,就能拼写得出口。在如此的文字系统之下,阅读时大脑对文字符号的处理要像处理口语那样严格按照字符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首先要把视觉形式转换为声音形式,再进行意义的解读,表现为一种“形—音—义”的加工和转换过程,所以语音加工是以表音字母文字为背景的儿童阅读能力获得和发展的核心认知因素(李秀红、静





进 2010)。二是字母文字数量之所以很小,其用心显然不在于语言表达时是以名物为中心,借以强调事物的空间规定性,而是以行为动作为重心,把动词词根作为语言构词的根基,强调事物的时间规定性。从现有可查的文献资料看(王文斌 2013),原始印欧语是以动词词根为基础,词汇的孳乳和扩大主要通过屈折、词缀等手段得以实现。Colebrooke(1805:11、12、38、129)就曾强调,梵语的词根是原生动词(crude verbs),而这些原生动词是多数名词的派生源,其派生手段就是借助词缀,譬如由“vah”(to convey)派生出“vāhana”(vehicle),由“cint”(to think)派生出“cintā”(idea)等。而现代印欧语诸语言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由动词性词根派生名词是其普遍的构词方式,如由英语动词“drink”派生出“drinker”“drinkery”“drinking”等名词;由德语动词“erfinden”(invent)派生出“Erfindung”(invention)“Erfinder”(inventor)等名词;由西班牙语动词“acto”(to act)派生出“actor”(actor)“actriz”(actress)“acción”(action)“actividad”(activity)等名词。的确,在原始印欧语里,大部分的词根均为动性词根。Michael West 于 1953 年编写了《通用英语词表》(*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共收入 1892 个词族,其中 1212 个是名词。根据查阅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s://www.etymonline.com/>),我们发现在这 1212 个名词中,295 个没有原始印欧语词根(PIE root)记录,9 个为派生名词,经剔除之后,余下 908 个均是有 PIE root 记录的名词词族。据目前初步统计,在这 908 个有 PIE root 记录的名词词族中,派生于原始印欧语动性词根的名词有 706 个,占比为 77.75%。现代英语中,有许多普通名词显然演绎于原始印欧语的动性词根。因篇幅受限,在此仅举以下十例:

(18) home: PIE root * (t) koimo-, suffixed form of root * tkei-, “to settle, dwell.”

(19) tree: PIE root * drew-o-, suffixed variant form of root * deru-, “be firm, solid.”

(20) grass: PIE root * ghros-, “young shoot, sprout,” from root * ghre-, “to grow, become green.”

(21) bed: PIE root * bhedh-, “to dig, pierce, prick.”

(22) flower: PIE root * bhel-, “to thrive, bloom.”

(23) worm: PIE root * wrmi- “worm,” from root * wer-, “to turn, bend.”

(24) face: PIE root * dhe-, “to set, put.”

(25) eye: PIE root * okw- “to see.”

(26) mouth: PIE root * men-, “to project.”

(27) arm: PIE root * ar-, “to fit together.”


古印度哲学(Raja 1957; Sarup 1962:5-6; Matilal 1990:19)认为,动词的基本概念就是表示“becoming”(发生、形成),而名词的基本概念则表示“being”(存在),而在“becoming”与“being”两者之间,“becoming”占主导地位。金克木(1996:3,31-33,85)对此有四点见解:其一,古印度人关于名生于动、行为在先、唯有动词的根才是根本等观念在印欧语关于词的形态研究中根深蒂固,作为一条根本性原则至今未曾发生变化;其二,这种关于语言词根理论的影响不限于古印度,而是延续至今;其三,不论当时或以后有多少不同派别和结构的语法,均承认词根,而词根大多均表示动词的意义;其四,就哲学观点而言,这种思想就是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在于行为、动作,动是根本,而静仅是表现。


汉语表意文字符号,属自源文字体系。与字符量小的字母表音文字不同,表意文字符号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字符量大。《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仅基础构件就达 558 个,由这些构件构成的字符数更是巨大(王宁 2000)。汉语现行的常用字加上历史上曾经用过的汉字字符总数在五万个以上(高明 1996:41)。如此庞大的表意字符量之所以存在,其缘由就是为记录数量同样庞大的名物。汉语强调名物,注重事物的形状、大小、位置关系等空间属性。“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易传·系辞传下·第二章》),可见观察物象对汉民族的重要性。据史书记载,仓颉造字常观奎星圆曲之势,察鸟兽蹄远之迹,依其类象之形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开创文明之基,被尊奉为“文祖仓颉”。汉语若不是以名物表述为主要特点,就无需如此庞大的字符量作为其书写系统(何清强、王文斌 2015)。恰如胡适(Hu Shih 1922:1)在其博士论文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中对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强调:


When things ar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knowledge will be extended to the utmost. When knowledge is extended to the utmost, our ideas will be made true. When our ideas are made true, our minds will be rectified. When our minds are rectified, our individual character will be improved. When our individual character is improved, our family will be well ordered. When the families are well ordered, the state will be well governed. When the states are well governed,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in peace. (其汉语大意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其实,胡适在此的这一番话是对宋代哲学家程颢和程颐阐释《大学》主旨的提炼。“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首要条件就是“物格”,由此可见,人们需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从中获得智慧,其关键是需要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强调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认识论命题:“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龚鹏程(2009a:10-12)指出,“在我国,文字可能比语言更值得注意”“文字可以见道,道即在文字或道与文字相关联”。

如上所述,汉字是自源文字。汉字各造字法被统称为“六书”,包括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才是真正的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却是用字法。在这四种造字法中,象形最为基础,其他三法都是对它的延伸和发展。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即“象物之形”,如:

(28) :火

(29) :竹

(30) :皿

(31) :雨

说得简单一些,象形的汉字,就是借用线条或笔画把所表达的客观事物的形体特征描绘成字,取象尽意,使人见字便能见形,见形便能见义。这种崇尚物象的造字思维方式浸润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体现出汉民族的思维表征取向。在此需强调的是,物象思维就是空间化思维,因为空间是物象的规定性特征。正因这种物象和空间化思维,汉民族能轻而易举地借用空间手段构造出具有会意性质的三叠字、四叠字、六叠字和八叠字,如“森”、“焱”、“𠄎”和“𠄎”等,其物象的可视性字形,能使人一目了然,即便不知其音,也能大致猜出其意,即基本能做到望字



生义。难怪莱布尼茨(Harbsmeier 1998:14)曾感叹,我们若能把握汉字的钥匙,就能开启汉民族思维的奥秘之门。

如果说英语文字多半是名源于动,那么汉语文字多半是动源于名。也因篇幅有限,我们在此仅举以名词性成分为构件而构造的10个汉语动词为例:

- (32) 闯:从马,从门。马出门貌。
- (33) 伐:从人,从戈。甲骨文字形,像用戈砍人的头。
- (34) 休:从人,从木。人依傍大树休息。
- (35) 扫:从手,从帚。手拿扫帚表示打扫。
- (36) 解: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表达字义。
- (37) 看:上是“手”字的变形,下是“目”,表示用手遮住眼睛远望。
- (38) 鸣:从口,从鸟。表示鸟声。
- (39) 采:从爪,从木。上象手,下象树木及其果实。表示以手在树上采摘果实和叶子。
- (40) 闪:从人,在门中。表示自门内偷看。
- (41) 投:从手,从殳。表示手拿兵器投掷。

可见,汉语的大多动词,其构字部件均是名词性的,个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认为,名词主要是用来表达事物的,而任何事物都具长、宽、高等三维特征。汉语重名物,本质上就是重空间。汉字历几千年保持其生命力,与汉语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保持了其偏重名物思维和空间性思维的特点相关。可以说正是汉民族强调名物的这一空间性特质使得汉字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必然,由此产生了延续几千年的对名物训释考据的学术传统,而非对语法分析的关切。这一点为学界所共知。1898年《马氏文通》产生之前,汉语研究基本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研究,而总体上只有专事于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传统小学研究,这就是一个佐证。

总之,文字与语言之间存在一种优选关系,文字须适配语言,而语言会促使文字的发展。这种优选关系表明,文字符号不是对语言意义的简单记录,而是充分体现其多样性和民族性。再者,通过文字符号特征的分析,我们可推知相关语言的基本特点。我们认为,文字符号与语言不仅具有优选关系,而且文字符号与语言表征必定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即文字的特征必定会投射到语言表征上。下文我们将以英汉的动词谓语句和名词谓语句为例,讨论英汉句构修辞的多样性和民族性。

三、语言修辞的多样性和民族性

如上所言,英语推崇具有时间性的线序表音文字符号,汉语崇尚具有空间性的立体象形表意文字符号。英汉文字符号的这种不同思维取向势必影响其语言表征。也如上所言,在此所言的语言修辞,是指宽泛意义上的人类组合语言符号的诸种表现方式。我们认为,不仅文字符号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语言修辞其实也概莫能外。语言修辞能折射出文化方式和自我存在的方式,蕴含着特定的民族思维方式。若说文字符号和语言修辞具有文化性,而文化具有民族性,那么就不难寻绎出文字符号和语言修辞具有民族性。语言修辞既具民族性,那么其多样性就不言自明。英语里,举凡句子通常都有动词做谓语,而在汉语,情况并非如此,句子常无动词,如英语(3a)和(4a)两句均有动词谓语,可其相应的汉语(3b)和(4b)两句,均无动词出现。

这两句汉语非但合乎汉语语法,而且很地道。兴许有人会说,这两句属于动词省略。我们在此不支持这一观点。

吕叔湘(2010:59)曾强调,省略需有两个条件:一是一句话若离开上下文或说话的环境,其意思就难以明确,须添补一定的词语使其意思清楚;二是经添补的词语实际上可以有,且所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这样才能说是省略了这个词语。朱德熙(2014:220-221)指出:“省略的说法不宜滥用,特别是不能因为一个句子意义上不自足就主观地说它省略了什么成分。譬如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对售票员说‘一张动物园’,这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什么也没省略。我们不能因这句话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意义不明确,就硬说它是‘我要买一张上动物园去的票’之类说法的省略。”启功(1997:2)对汉语句子成分省略观也持否定态度,不无戏谑地说:“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常见句中‘主、谓、宾’元素不全的现象,在填不满一条模子时,便以‘省略’称之。猿有尾巴,人没尾巴,是进化原因呢,还是人类‘省略’了尾巴呢?孔雀尾长,鹤鹑尾秃,恐怕也难以‘省略’称之。可见省略太多,便微有遁辞的嫌疑。”的确,若说(3b)和(4b)两句是省略动词,那么究竟省略了什么动词?是否像吕叔湘所说“所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试看以下几句:

- (42) 树林前边有一个湖。
- (43) 树林前边是一个湖。
- (44) 树林前边出现一个湖。
- (45) 树林前边隔着一个湖。
- (46) 树林前边横着一个湖。

可见,(4b)所添补的词语并非只有一种可能,省略观由此难以自圆。

很多汉语句子虽同英语,都含谓语动词,但不含动词的名词谓语句在日常语言使用中也极为常见,如:

- (47) 整个大麦场上一片混乱,一片灰烬。(《艳阳天》,1318)
- (48) 马小辫这家伙一肚子脓水。(《艳阳天》,778)
- (49)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满江红·写怀》)
- (5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艳阳天》,1399)

这些句子若分别直译为英语句子,那么其句构就不合英语语法:

- (47a) * The whole thrashing ground for wheat chaos and ashes.
- (48a) * Ma Xiaobian, this guy, a stomachful of pus.
- (49a) * Thirty fame dust and earth, eight thousand miles of clouds and moonlight.
- (50a) * A small mind not a gentleman. No poison not a husband.

其实,这几个汉语句子译入英语时,虽在语义及其隐喻义上需采用不同的表达,但不管怎样,英语每个句子都需有动词谓语:

- (47b) The whole thrashing ground for wheat was in chaos and ashes.
- (48b) Ma Xiaobian, this guy, is full of evil ideas.
- (49b) Thirty years of fame is nothing but dust and earth, although the journey of eight thousand miles I have endured has been full of clouds and moonlight.
- (50b) A narrow mind cannot make a gentleman. Ruthlessness is the mark of a truly great man.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英语句构修辞十分注重动词,而且还推崇动词的时体(tense and aspect),而推崇时体的本质就是关切时间。其实,如上文所说,注重动词,其实质也是睽重时间,这是因为语言符号中的动词是用来表达事物的行为或动作,而任何行为或动作都具有时间性,时时刻刻都能传达出时间信息。恰如亚里士多德(1986:56)所言:一个词除其本身意义之外还携带着时间的概念者,这就是动词。因此,英语句构修辞注重动词,就根本而言就是睽重时间,与印欧民族思维深处所认定的“动是事物的根本特性”(Nakamura 1983:505)一脉相通。

汉语语言符号的修辞则不同,往往偏爱对事物的表达。汉民族长期熏染于古人“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传统思维方式,普遍认为一切运动肇始于事物,事物是一切运动的主体,由此养成了“观物取象”的思维习惯,事物也就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龚鹏程(2009:122-127)在论及印欧语与汉语的差异时指出,中国人注重“thing”,自古推尊格物致知,强调观察名之所以为此名,旨在可以知物之何以为此物;名学皆在正名,凡物,皆当有名去指称它,故《管子》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返相为情”。《道德经》在开章中就强调:“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由此可见,汉民族推崇物的思维久已成习。造句时,诚如清末民初黄侃(2014:119)在其《文心雕龙札记》的章句篇中所言“前人未暇言者,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无不明”。而在此的字则往往以事物的具象为据,即观物立象,因象而名。儒家一流之正名论与辩者一流的定名论也均强调定名须合乎“象”,而“理”会于“象”内,恰如战国时期《尹文子》所强调的:“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中国古人的这些言论不难看出,字所状的名,名所表的物,在句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表达思想时,行为或动作并不十分重要。王艾录(2007)指出,主谓俱全并不是汉语成句的充要条件。而汉语句子修辞中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事物的名词。郭绍虞(1978:331-332)早就提出,西洋语法重动词,而汉语语法则重名词,汉语的本质是不可能以动词为重点的。郭绍虞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他进一步指出,汉语的语法脉络往往是借助词组,即积词组而成句,而词组又是以名词性词组为最,如:

(51)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哪里有个坐着的空儿。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句(51)出现好几个名词及其名词性词组,郭绍虞(1985:334-335)对此指出,此话毫无调文弄墨之嫌,因多用四言词组,所以显得干净利索,说得非常清楚,尽管似连非连,却又能生动具体,这就是迥异于印欧语的汉语特点,而且是以往语法学界不大注意的现象。本文中的(3b)、(4b)、(47)、(48)、(49)和(50)这些名词谓语句,说到底就是汉语句构修辞重名词的表现。汉语中固然有许多类似于英语的动词谓语句,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汉语名词谓语句的独特性。汉英民族毕竟生存于同一个星球,具有大同小异的自然环境,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霜雪云雾、江山湖海、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同样需要为繁衍生息而表现出各种行为或动作。在语言修辞中借用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手举足投、口表目看等,这是十分正常的。然而,正如王文斌(2018:1)所指出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这恰如人类,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的本质,而人与人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的本质。我们不能因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而轻忽彼此的差异性,也不能因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而忽视彼此的相似性。然而,若要洞察语言的个性,所



需要的恰恰是须透视各语言的鲜明差异性,这就诚如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我们观察一个人,所关注的常常不是其与他人的共性,而是关注其个性。我们认为,在语言符号的对比研究中,对语际差异性进行深度审察,其重要性远远高于对语际相似性的探究。汉语句构修辞中常不用动词谓语句,而是使用名词谓语句,这是汉语的一个独特个性,需认真探究。

关于汉语的名词谓语句,陈满华(2008)和易华萍(2012)等曾做过较为系统的考察。尽管陈满华谈的是体词谓语句,可其实主要是名词谓语句。陈满华(2008)对名词谓语句的现当代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并对名词谓语句的性质、类型、语用、修辞、及物性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同时对古代汉语、方言和熟语里的名词谓语句也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还对其进行了语言类型学视角的探讨。易华萍(2012)对名词谓语句的考察视角更是宏阔,对先秦、中古、近代和当代的汉语名词谓语句做了较为全面的析述,还对唐诗、宋词、元曲、谚语、政论文中的名词谓语句进行了富有见解的讨论,同时对英汉名词谓语句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比较,指出杨宪益等翻译的《红楼梦》中,汉语所采用的名词谓语句,译入英语后采用动词谓语句的共211例(易花萍2012:280)。我们在此无意于评析这两部专著的优劣,仅想说明名词谓语句普遍存在于汉语句构修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也昭示句构修辞也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

胡敕瑞(1999)指出,汉语的句构只需名物概念的意会,而无须突出行为动词,如同会意字“休”是由“人”和“木”构成,是由两个名物构成一个动词“休”,由此展现出或明或暗的汉字特质与汉语句构特质之间的相关性。此话极是。汉语的许多句构修辞就像会意字,借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依据事理加以组合,构建新的汉字,上文所举的(28)至(37)也都是会意字,如“人”与“戈”这两个名物相加,就构成了动词“伐”。汉语的句构修辞也是如此,如:

(5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

(53) 她妹妹大眼睛。(陈满华2008:1)

(54) 一命二运三风水。(《儿女英雄传》,535)

(55)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韩信墓前祠堂中的对联)

从(52)至(55),全是名词性短语组合的句子。(55)是对汉朝大将韩信一生的总结,寥寥十字,高度浓缩了他一生中的几个重大经历。从表面上看,“生死”和“存亡”是动词,可在此明显是指韩信的两大经历,谁又能说这两个不是名词性短语?

我们认为,汉语句构关切名物,其实就是关注空间,因为如上所提,任何名物都负载着长、宽、高及由此形成的面、体和量等空间信息。在此我们需再次强调的是,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符号修辞的本质,而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符号修辞的本质。而若想追索语言符号修辞的个性,我们更需重视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唯有差异性,才会彰显出其个性。在此更需强调的是,语言符号的修辞,充其量只是形式,隐藏于形式背后的内容,无疑涵纳着使用特定语言符号修辞的民族的思维。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是语言差异性的外在表现,普遍存在的汉语名词谓语句就是一个力证。记得英国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曾说过:“Language is the dress of thought.”(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在语言修辞的背后,必定隐藏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思维方式。





四、结 语

语言是人类使用符号的主要形式,是人类交流和传达思想的重要载体,但语言符号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使用语言符号的方式往往具有差异性,由此表现出语言符号的多样性。修辞是人类组合语言符号的方式,能折射出文化方式和自我存在方式,承载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思维方式。如果说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文化性,文化具有民族性,那就自然可推演出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民族性。英汉语的文字符号差异和句构修辞差异充分说明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而且隐匿于这些差异背后的是英汉民族的时空观差别:英民族偏爱时间性思维,而汉民族则睽重空间性思维。

参考文献

- [英]奥斯特勒 2011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章璐、梵非、蒋哲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满华 2008 《体词谓语句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 高明 1996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龚鹏程 2009 《文化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 郭绍虞 1978 汉语词组对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郭绍虞主编《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绍虞 1985 《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何清强、王文斌 2015 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英汉语言与文字关系探析,《中国外语》第3期。
- 胡敕瑞 1999 对汉字与汉语性质的几点认识,《古汉语研究》第1期。
- 季羨林主编 2009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金克木 1996 《梵佛探》,河北教育出版社。
- 李葆嘉 1990 论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 李秀红、静进 2010 汉语阅读脑功能磁共振的研究进展(综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7期。
- 吕叔湘 2010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启功 1997 《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
- 王艾录 2007 汉语成句理据再思考——以“鸟飞”“鸟飞了”为例,《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王宁 2000 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期。
- 王文斌 2013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王文斌 2018 从独语句的存在看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当代修辞学》第2期。
- 王文斌 2018 《论英汉时空性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出)
- 吴为章 1990 《主谓短语·主谓句》,人民教育出版社。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1986 《范畴篇 解释篇》,商务印书馆。
- 易华萍 2012 《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法律出版社。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 周有光 1998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
- 朱德熙 2014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Colebrooke T. A. 1805 *Grammar of the Sanscrit Language* (Vol. 1). Calcutta: the Honorable Company's Press.
- Harbsmeier, C. 1998 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J. Needham (ed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Shih 192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 Matilal, B. K. 1990 *The Word and the World; India'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kamura, H. 1983 *A History of Early Vedānta Philosoph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Raja, K. 1957 Yaskas' definition of the 'verb' and the 'noun' in the light of Bhartrhari's explanations. *Anna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3): 86-88.
- Sarup, L. 1962 *The Nighaṇṭu and the Nirukta: the Oldest Indian Treatise on Etymology, Philology, and Semantic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The Diversity and Nationality of Language Signs and Rhetoric

Wang Wenbin & Cui Liang

Abstract: Semiotic Rhetoric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basic ways in which human beings use signs to express ideas. Language is the main form of signs used by humans and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human thought. However, language signs vary from nation to nation and thus demonstrate their diversity. Rhetoric is the representation mode of how humans combine signs, carrying particular ways of thinking by particular nations. If we say that language signs and rhetoric bear culture, and culture embodies nationality, then it can be safe to say that language signs and rhetoric are of nationality. The differences of writing symbols and sentence rhetoric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n strongly reveal that language signs and rhetoric are characteristic of diversity and nationality, and that it is the disparity of the temporality in the English nation's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spatiality in the Chinese that lie hidden behind these differences: the English people prefer the temporal mode of thinking, while the Chinese tend to think in the spatial mode.

Keywords: signs, rhetoric, phonograph, ideograph, sentence construction, diversity, nationality

《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等著作出版

2018年11月《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公关语言学》(第五版)、《清心望远——贺黎运汉教授九秩华诞》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是黎运汉教授的第三部语言风格学专著。该书从文化角度研究汉语风格,阐释风格成因、风格手段、风格类型与民族文化诸要素的关系。

《公关语言学》发行量达10多万册。新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增写了《公关模糊语言》(黎运汉执笔)、《公关语言网络表达艺术》(孟建安执笔)两章。

《清心望远——贺黎运汉教授九秩华诞》,汇集了黎教授词汇学、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诸多名家序言、题辞、书评等。(伊萍)

